

「日佔廣東」時期女性活動與 殖民地臺灣的助力*

盧 梓 滿**

摘 要

本文探討「日佔廣東」期間，日方策畫的各種女性活動，與殖民地臺灣的人力支援，從中析理兩者的關聯性及其特色。1938年日軍攻佔廣州後，徵召臺灣的相關人才前

* 本文改寫自碩論〈「日佔廣東」的婦女動員及教化(1938-194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21)的第三章。修改期間感謝游鑑明、連玲玲、葉韋君、藍適齊等教授的指點，以及編輯委員和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特致謝忱。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收稿日期：2023年1月5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年4月24日。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往當地，進行一系列的社會掌控，其中涉及華南文化協會的教師培訓、博愛會醫院的護士培育、廣東共榮會的文化宣傳活動。以共榮會主事人井上正男為例，他在推展文化業務的同時，兼辦女子教化活動。換句話說，日治臺灣的女子教化，不僅是戰時臺灣的婦女動員，更透過殖民地的境外活動，意圖把殖民臺灣的經驗，用來對廣東佔領地女性的教化及號召，包括女子宣撫活動、女學生負笈臺灣、對臺灣女子教育的實地視察，以及看護婦的防疫措施。

關鍵詞：日佔廣東、廣東共榮會、廣東博愛會醫院、廣東女性、華南文化協會

前 言

1946年2月，臺南縣斗六鎮民吳桂春(1902-1960)等人，向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1883-1950)提交陳情書，他們陳述女兒，在日治時期從女子中學或家政學校畢業後，就因臺灣總督府徵召而前往廣州從事看護助手。戰爭既然結束，他們懇請政府讓流落廣東的女兒返臺，於是陳儀請廣東當局公署設法讓這群看護助手優先回鄉。¹

這些戰時台灣女兒的故事，引起筆者的研究興趣，她們如何串連殖民地台灣與日佔廣東的聯繫？本文著手探究「日佔廣東」下的女性活動，與殖民地台灣之間的互動關係及其

1 「廣東臺籍女看護助手救濟陳情案」(1946年2月3日)，〈廣東臺籍醫務人員返籍接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檔號00306520010007。

特色。1938年10月，日軍佔領廣州後，最先的布局是攏絡在地紳民，籌組廣東治安維持委員會、執行宣撫事務。與此同時，日方徵調臺灣行政專員前往廣東支援，進行社會管控，遍及警政、醫療、教育、文化等範疇。本文將集中討論日本當局如何藉助臺灣專員的殖民地閱歷，於教師培育、醫院、文藝等機構，對廣東女性實施教化活動，使當地女性服膺於日軍麾下，進而塑造為「大東亞戰爭」的支援者。臺灣殖民經驗作為日本南進政策的跳板，以臺灣為據點，啟動「南支南洋政策」，逐漸將勢力擴至華南及東南亞地區。以鍾淑敏的研究為主，她先是回顧南進研究，² 進而以日據海南時期(1939-1945)，提出「再殖民」的概念。³ 同樣的，日佔廣東期間，臺灣的人力也以協助角色，負起當地社會掌控的重任。朱德蘭則著墨於日方在廣東實行經濟統制策略，如聯合臺灣總督府出張所，成立「廣東物資輸移入配合聯合會」，操縱物資流動，力求「以戰養戰」。⁴ 王麒銘則是探索臺灣殖民政府襄助日軍部署，涉足作戰支援方案等。⁵ 另有山本真以調查為本，探析臺灣總督府派遣調查專員赴粵，視察廣東社會現狀，蒐羅當地各項資訊及相關情報。⁶

2 鍾淑敏，〈日治時期南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8），頁2063-2090。

3 鍾淑敏，〈殖民與再殖民——日治時期臺灣與海南島關係之研究〉，《臺大歷史學報》，期31（2003年6月），頁169-221。

4 朱德蘭，〈日汪合作與廣東省政府關係一個側面的考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卷12期4（2000年12月），頁631-655。

5 王麒銘，〈日中戰爭期における臺灣總督府の占領地協力について—広東を中心〉，《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論文集》，號57（2017年6月），頁53-89。

6 山本真，〈戰時期の華南調査について—福建・広東を中心に〉，收入久保亨、瀧下彩子編，《戰前日本の華中・華南調査》（東京：東

中日戰起，臺灣總督府配合日軍作戰，即在全島各地施行婦女界的動員工作。游鑑明的研究，闡發戰時臺灣婦女動員的方式；⁷ 楊雅慧釐析臺灣婦女做為日軍後方動員的課題，論及強化女性與家庭的緊密關係；⁸ 吳欣樺則論析臺籍女看護分赴前方戰線的態勢。⁹ 循著前人鑽研的纍纍碩果，本文將探求日軍入侵廣東後，是如何借助殖民地臺灣的外力，擘畫各式各樣的女性活動。

日佔廣東時期，為招攬婦女界人士，籌設婦女組織，施以女界宣撫工作，兼營辦婦女事務。起初，先組建廣東婦女維持會，後擴充為婦女會。1940年9月，汪兆銘政權統轄的廣東省政府啟幕，陳璧君(1891-1959)將婦女會改組為廣東省婦女會，統籌各縣、市婦女會，執行各項的婦運事務。¹⁰ 本研究試圖追溯日本在廣東施行女子活動過程中，從臺灣調派的人手，扮演著哪些的角色？這些活動的具體內容有何？

洋文庫，2021），頁41-44。

- 7 游鑑明，〈受益者抑受害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臺灣女性(1937-1945)〉，收入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205-206。
- 8 楊雅慧，〈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婦女(1937-1945)：日本殖民政府的教化與動員〉（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7月），頁123-126。
- 9 吳欣樺，〈硝煙與白衣：日治末期的臺灣從軍看護婦〉（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1月）。
- 10 盧梓滿，〈汪政權成立前後廣東的婦女動員(1938-1945)〉，《政大史粹》，期35（2020年9月），頁118-119。

一、從戰前南進經營者到戰時佔領協助者—— 臺灣總督府在廣州活動的梗概

要瞭解戰時廣東與臺灣的互動樣態，我們必先從戰前日本在廣東的南支政策進展談起。臺灣總督府配合日本南進政策，於華南地區展開一系列的經營活動，包括辦學、醫院、報業三大政策。¹¹ 首先，在籍民教育方面，1915年，日人創辦廣東日本人學校，殖民政府一邊提供資金援助，一邊派出教員至該地授課。¹² 1933年，殖民當局派澁田榮一接任該校校長、片山隆為訓導，他倆也曾在臺灣公立小學校任職。¹³ 直到1937年中日戰爭，廣東日本僑民避居至沙面(shameen)，待日軍進據廣州後，澁田氏迅即參與宣撫活動、籌辦日語學校等。¹⁴ 由此可知，戰前日方籍民教育奏效，加快社會管理的步調。

其次，1918年，總督府開設廣東博愛會醫院，專營當地的醫療事業。1921年，更增設看護婦培育機關，招收16至

11 王學新，〈抗戰前博愛會醫院之運作與日本大陸政策之關係〉，《逢甲人文社會學報》，期16（2008年6月），頁108。

12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上冊，頁62-63。

13 〈在外日本人学校教育關係雜件／国民学校教育費補助關係 第六卷 2・昭和八年度内地人学校費国库補助金二関スル件。亜二、普通、合、第七三号、八、一、二十七。以下次へツヅク（10）広東（1933年3月20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戰前期外務省記錄／I 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 1類／文化、文化施設 5項／学校 O目在外日本人学校教育關係雜件／国民学校教育費補助關係 第6卷》，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檔號B04011521200。

14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二伴フ對南方施策狀況》（臺北：臺灣總督府外事部，1943），頁164。

25歲，具備高等小學校教育程度的中國女子，制訂二年制學科課程，至1927年，改為三年制。¹⁵ 該院除贈醫施藥外，亦充當中日親善機構，以便「扶植潛在勢力的成效」。¹⁶

日治時期臺灣與廣東之間的人際流動，其中也有台灣護士赴粵的生命故事，葉秀香(1914-1999)原在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醫院供職，後轉至廣州市博愛會醫院，並引介同事尹喜妹(1913-?)赴該院服務。¹⁷ 尹氏為「臺灣護理界的先鋒」人物，祖籍廣東，1936年在該院服務期間，與當地護士採用日語和粵語互動教學，後因戰事，醫院被強制撤走而返臺。¹⁸ 博愛會醫院則在日軍攻下廣州後，再次復業。1938年10月21日，日軍攻陷廣州後，以「廣東連絡會議」為管治當地的最高機關。此機關是由陸軍、海軍、外務三省聯合主導，而臺灣殖民政府外務部長加藤三郎也參與其中，共同磋商廣東佔領區內的掌管辦法，並特設臺灣總督府事務所，辦理臺、粵兩地的往來事務，其中以陸軍省特務機關權責最大，統率廣東一切的政務。¹⁹

-
- 15 中村孝志，〈廣東博愛會醫院をめぐる諸問題(2)—臺灣總督府の対華文化工作—〉，《天理大学学报》，號166（1991年3月），頁4-5。
 - 16 王學新，〈抗戰前博愛會醫院之運作與日本大陸政策之關係〉，《逢甲人文社會學報》，期16（2008年6月），頁126。
 - 17 藍適齊，〈「帝國」（未盡）的殖民／戰爭責任：二戰後在香港被拘留遣返的臺灣平民〉，收入呂芳上主編，《戰後變局與戰爭記憶》（臺北：國史館，2015），頁198-199。
 - 18 游鑑明，《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10、33-35；游鑑明，《日本殖民下的她們：展現能力，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2），頁284-292。
 - 19 朱德蘭，〈日汪合作與廣東省政府關係一個側面的考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卷12期4（2000年12月），頁639。

日軍全面進駐廣州城，第一步即引導地方士紳招撫民眾，以穩定社會。日方以粵治粵，倡組廣東治安維持委員會（以下簡稱：維持會），為首個廣東的傀儡組織，肩負招撫及地方行政。²⁰ 該會籌建階段，彭東原(1882-1954)等人曾取道臺灣，商討籌備要務。²¹ 同年 12 月 20 日，維持會成立，彭東原膺任委員會長；呂春榮(1887-1945)任副委員長兼保安處長；其餘委員有商衍鑿(1887-?)、陳覺民(1876-1945)等，概皆粵籍仕紳。²² 總督府派遣內務局事務官西村高兄(1900-1988)，以陸軍囑託（委托）身分，擔任維持會的首席顧問，輔助「大廣東的復興建設」的重任。²³

當年 12 月，廣東婦女維持會也應運而生，由前高等法院女書記石應蓮擔任會長、呂春榮妻子劉惠瓊為副會長，²⁴ 首要負責婦女治安事務，公開地拉攏各界女性，以說服或威脅她們接受日軍及傀儡組織的管治。²⁵

進一步觀察，對日本佔領者而言，必須提防近代廣東婦

20 朱德蘭，〈日汪合作與廣東省政府關係一個側面的考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卷 12 期 4（2000 年 12 月），頁 631-655。

21 彭東原，曾任黎元洪大總統府顧問、膠濟鐵路管理局委員。東亞問題調查會編，《最新支那要人傳》（東京：朝日新聞社，1941），頁 189。〈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八十二）〉，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80200-00509-070。

22 廣東治安維持委員會秘書處，《廣東治安維持委員會公報》（廣州：廣東治安維持委員會秘書處，1939），頁 1-2；朱德蘭，〈日汪合作與廣東省政府關係一個側面的考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卷 12 期 4（2000 年 12 月），頁 640。

23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二伴フ對南方施策狀況》，頁 165。

24 〈廣州敵偽近事 漢奸妻女獻媚〉，《南洋商報》（新加坡），1939 年 8 月 3 日，第 27 版。

25 盧梓滿，〈汪政權成立前後廣東的婦女動員(1938-1945)〉，頁 113-149。

運後的激進女權。根據廣州作戰前夕，日軍陸軍省步兵第九旅團，要求精通廣東社會的臺灣人做一份廣東人特性的考察報告。在這報告書中，指陳廣東女性非常有警戒性，既對國民政府忠心耿耿，且積極行使自身的參政權；又提及當地各行各業的女性工作者。²⁶ 申言之，為防備婦女團體集結反抗力量，日本當局不能授予她們更多實權。但以知識女性階層為主的婦女會，又難以動員地方婦女活動，所以日方若需動員女性支援戰事，得從臺灣派員開辦，為從宜之計。

「日佔廣東」的總督府迥異於戰前的南進經營者，而是佔領區協助者角色，並完全聽命於日軍的指揮及戰略部署。因此在陸軍省特務機關全盤執掌廣東政情下，從臺灣調派專員。雖然，這些人員並非從事女性教化的專家，但皆具備殖民臺灣經驗，進而展開各種女性活動，並是下文討論的核心。

二、華南文化協會與女子教育活動

1938年12月，維持會首當要務是推出日式教育方針。在當局制定的教育辦法中，臺灣總督府發揮作用。起先，編製教科書方面，1939年2月，維持會組成「小學校教科書編纂委員會」，接洽教科書編纂的辦學事宜，並聘任臺灣人菅向榮(1898-?)為主任委員，另委派菅氏赴臺視察中小學教育工作。²⁷ 同時，日方在廣東當局委任總督府文教局專員編纂

26 「廣東人の特異性と之に対する注意」，〈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陸軍一般史料／支那／支那事變／北支／陣中日誌 昭和13年9月〉，《陸軍一般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號C11111586600。

27 他原名徐向榮，苗栗客家人，曾任臺灣總督府師範學校教諭，並於警

小學教科書，合共 79 冊，包含修身、體育、歷史等。²⁸ 再來是針對廣東師資培育，由「華南文化協會」首開其端。

華南文化協會創始於 1939 年 8 月 8 日，該會的機關刊物對外聲言：統攝廣東佔領區內「中日親善」為旨趣，其使命在共築「新的東亞」新局。²⁹ 日本陸軍特務機關長中野英光(1890-1982)親臨主持成立典禮，出席嘉賓有日本駐廣州總領事喜多長雄(1912-2000)、軍憲兵隊長林清、彭東原等。³⁰ 並推維持會民政處長歐大慶(1895-?)為第一屆會長，³¹ 總覽會務，下轄中央部，分設總務部、事業部、調查部。³²

該會以「建設新東亞」為準繩，組織匯聚在地中、日名流，採滿州國協和會經驗(1932-1945)，標榜「民族協和」的

察官及司獄練習所任講師，著有《標準廣東語典》。見陳麗華，《族群與國家：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1683-1973)》(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 153；廣東治安維持委員會秘書處，《廣東治安維持委員會公報》，頁 201。

- 28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二伴ノ對南方施策狀況》，頁 175-180。
- 29 〈會報發刊詞〉，《華南文化協會會報》(廣州)，期 1 (1939 年 11 月)，頁 1。
- 30 〈4. 学会協會(9)華南文化協會 14、8〉，《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戰前期外務省記錄／H 門 東方文化事業／7 類 資料／2 項 參考資料／O 目 參考資料關係雜件／宗教、病院、図書館、博覽會、教会關係 第 2 卷》，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檔號 B05016192400。〈本會舉行成立典禮之盛況〉，《華南文化協會會報》(廣州)，期 1 (1939 年 11 月)，頁 6。
- 31 歐大慶曾任廣東省政府顧問。日佔北平後，出任北平維持會顧問，足證他有招撫經驗。見東亞問題調查會編，《最新支那要人傳》，頁 25。
- 32 顧問有彭東原、呂春榮、宇垣完爾、喜多長雄、林清、吉田榮次神、白鳥勝義(軍調查班副班長)，而委員陣容包括李家英、梁致明、羅又村、胡國華(民政處學務科科長)、大久保忠鑑、中井淳、宮本延人、草彌靜一、牧野豐三郎、關口溫知、北山富久二郎。〈職員名表(九月末現在)〉，《華南文化協會會報》(廣州)，期 1 (1939 年 11 月)，頁 7。

同化政策，培植效忠的精英青年。³³

事實上，華南文化協會的實權由日方把持，多數具備臺灣經驗。如名譽會員西村高兄、唐澤信夫（1894-?，臺北州臺北市會議員）、半田恭平（1891-?，高雄州潮州郡役所地方理事官）、山中覺（警務局衛生課技師）、澁田榮一；正會員宮本延人（1901-1987）、中井淳（1903-1954，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教授）、北山富久二郎（1901-?，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助教授）等。³⁴

該會設有女子科隸屬事業部，專門辦理婦女與兒童的事務：徵召女會員、主持家政與知識婦女調查、聯絡婦女社團、增辦婦女問題研究會等。³⁵ 該會透過籌辦活動、聚集各界會員，共築婦女界的互動平台。女子科肩負婦女教化的重任，非但操辦女界聯誼活動，同時也游移於普羅婦女與日本當局間，展開招攬任務，扮演日人在廣東婦女界的中介者角色。

（一）小學校教員訓練

維持會因應初等教育所需，故命下轄學務課，聯合華南文化協會要員，創設小學校教員訓練所，作為培養日式師資的教育場所。該所直屬事業部訓育科，由歐大慶兼任所長，意在勸進當地初等教育從業者，履行小學教員的師資培育計

33 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48-50.

34 〈會員名表〉，《華南文化協會會報》（廣州），期1（1939年11月），頁9。

35 〈女子科十、十一月工作摘要〉，《華南文化協會會報》（廣州），期2（1940年1月），頁22；〈女子科一月工作摘要〉，《華南文化協會會報》（廣州），期4（1940年3月），頁25。

劃。訓練所的實際掌舵者為宮本延人，負責審定所有教育行政與小學教材。³⁶ 尤值注意的是，宮本專精臺灣民族學調查，曾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助手，在粵擔任南支派遣軍廣東調查班成員，從事各項研調工作。³⁷

據宮本回述，當局設置訓練所的主因，是透過「教員再教育」課程，施以思想改造，負起「大東亞共榮圈」的同化任務。日本當局委派他統籌訓練所，很大程度是因他有民族學的研究背景。³⁸ 然而，宮本不但不會國語，更不懂廣東話，故他倚靠來自臺灣公學校的3位臺籍老師宋登才、羅秋榮、廖宗龍，負責雙方教育上的翻譯工作。³⁹ 由是觀之，日本在廣州制訂的教育方針，乃是聘用臺灣經驗者為骨幹，指派他們執行當地初等教育的指引者，以符合日式殖民教育目標。

訓練所在廣州市公開招考，再經維持會學務課考選，從逾300報考者中，錄取191人（女66、男125）。訓練所指導方針，著重體育與精神訓練並行，其餘有禮儀、言行舉止等。所有受訓學員一律住校，並供給衣服和膳食安排。⁴⁰ 招募教員雖以男性占多數，但仍未忽略女性施教角色。

據第一期女學員李玲回憶，1個半月的培訓課程，日常

36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廣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63），輯10，頁149-150。

37 葉碧苓，《學術先鋒：臺北帝國大學與日本南進政策之研究》（新北：稻鄉出版社，2010），頁197-199。

38 宮本延人口述，宋文薰、連照美譯，《我的臺灣紀行》（臺北：南天書局，1998），頁193。

39 宮本延人口述，宋文薰、連照美譯，《我的臺灣紀行》，頁193。

40 〈小學校教員第一期訓練〉，《華南文化協會會報》，期1（1939年11月），頁17。

庶務全由臺灣人管理，女學員必須身穿白衫黑裙，晨間由導師傳授日式唱遊或體操。男女體操授課內容截然不同，男生習劈刺術、女生則是柔軟操，並組歌詠隊，教唱「支那之夜」、「日本國歌」等。⁴¹

學員雁萍在《華南公論》分享受訓的日常點滴：每晨的朝會典禮，全體學員整齊列隊，響起升旗禮，齊聲高呼「努力建設新東亞」、「新東亞是日華滿親善」等口號。經教師們逐一檢查學員服裝後，學員即排列於運動場內，配合播音，由教師平澤平三(1896-?)指揮體操演練。她們也視跑步訓練為「家常茶飯」，並自詡是「時代鬥士」。⁴² 女學員的訓練，側重於「大東亞主義」的政治意識，以鍛鍊身體，滋育奉承日式教育的新血。

1939年8月，第一期學員結業時，維持會民政處秘書李萬志，率領全體學員，赴臺灣視察各學校教育狀況。⁴³ 這趟視察團分為兩隊，男學員為第一隊，於23日啓程；女學員為第二隊，於25日出發。由臺灣總督府學務課和領隊宮本延人帶領，參觀臺北各教育、文化機關，以及社會設施。當局還特意安排學員至草山林間學校，接受為期5天的學習課程。特別向女學員施以日語和體操的指導，專請國府種武(1900-?)、平松譽資事(臺北第一師範附屬公學校訓導)、羅

41 李齊念編，《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輯7，頁315-317。

42 雁萍，〈所中生活片段：獻給關心廣東小學教員訓練所的人們〉，《華南公論》(廣州)，卷1期2(1939年12月)，頁225-227。

43 〈小學教職員定期赴臺考察教育〉，《廣州民聲日報》(廣州)，1939年8月16日，第3版。

秋榮、李偉器、平澤平三等講師，授予相關課程。⁴⁴ 女學員從高雄至臺北後，由臺灣婦女界原籍福建或廣東人士招待，以示親切。之後，她們到訪臺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學校、臺灣師範學校、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等，參訪日本師範學校時，則由女學生演示即席插花和侍奉夫婿。⁴⁵

由此可知，維持會藉臺灣踏查活動，一方面增強學員對日向心力；另一方面，透過參照臺灣經驗，讓學員明瞭日式教化目標，同時展示臺灣女子教育的近代化發展。

當時《臺灣日日新報》也大幅報導維持會女性學員的在臺活動。她們乍到臺灣的大合照中，可見全體團員穿戴整齊，與日本女學生並無二致。總務長官森岡二郎(1886-1950)接見她們時亦宣稱，廣東的教育事業，與日本有「同文同種」的淵源，雖因中日交戰，但維持會當使中國欣欣向榮。此行臺灣觀摩的用意，是力促她們推動「新廣東」文化建設。⁴⁶ 隨後，女教員隊赴淡水海水浴場，報導描述這是她們首次的游泳體驗。在浴場休憩所內，視察員與淡水女子青年團聯誼，充分呈顯「日華親善」的實踐。⁴⁷

各大報紙更刊出女教員團的查勘心得，她們提及臺灣的女子教育和禮儀作法，與「內地人」一致，視察臺灣教育後，她們不僅增添對日認識，同時受鼓舞，回廣東推動「第二國

44 〈第一期訓練所學生視察臺灣〉，《華南文化協會會報》（廣州），期1（1939年11月），頁20。

45 李齊念編，《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輯7，頁315-317。

46 〈廣東的女教員隊けさ島都入り先づ臺灣神社に參拜〉，《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9年8月30日，第2版。

47 〈廣東女教員團 淡水に遊ぶ〉，《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9年9月4日，第3版。

民教育」。⁴⁸ 從報導可知，日本試圖利用是次廣東女教員團，達致多重宣傳效果。先是指導女教員們對日式教育的認識，再透過她們返回廣東，落實日式初等教育課程，並向他人分享臺灣優秀的教育觀感，淡化日軍侵略行爲；另藉報紙宣傳，對臺灣人塑造日佔廣東女性待教化的形象，比如初次的游泳體驗。由此顯現，日本宣揚殖民臺灣女子教育的成就，一方面向臺灣人傳達殖民教育可支配新佔領區的訊息，另方面向廣東人闡揚殖民地的繁盛景象，力圖構建「大東亞主義」的「想像共同體」。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當局側重女教員的唱遊教學。從1939年10月起，廣州市內各小學校陸續開學，但因體育教科書尚未運抵，所以訓練所集合各校女教員於假日返所受訓，由高橋ミフエ教授唱遊教學要訣，速予仿行。⁴⁹ 是月下旬，維持會慶賀日軍「廣州勝利」紀念日，熱烈舉行全市公立小學校運動會，突出女教師們的唱遊演出，益進同儕間的默契。⁵⁰ 又在11月，臺北帝國大學體育教授到訪廣州時，專程到教員訓練所，檢視各校新式體育運動的實況。此際所方預先函知各校教員回所集訓，復舉辦小學教員體操練習會，從而呼籲全體教員注重「康健體魄」的精神。⁵¹ 顯然日

48 〈まだ臺灣に居たい廣東女教員團員の告白〉，《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9年9月17日，第2版。

49 〈小學女教員訓練唱遊〉，《廣東迅報》（廣州），1939年10月7日，第3頁；〈公立小學教員星期日須受訓練〉，《廣東迅報》（廣州），1939年11月19日，第3頁。

50 〈全市公立小學校舉行運動會盛況〉，《廣東迅報》（廣州），1939年10月21日，第3頁。

51 〈臺北帝大體育教授蒞粵〉，《廣東迅報》（廣州），1939年11月15日，第3頁。

治臺灣殖民經驗中的身體改造，⁵² 也在臺灣體育教師來粵考察中體現。

（二）指導留日女學生

華南文化協會除提供教員培訓之外，還負責官費留日學生的遴薦事宜。10 位考核委員中，擁有臺灣教育經驗者佔 8 人。包括宮本延人、藤澤祐（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助手）、吉澤宗吉（臺北州州立臺北第一中學校教諭）、中井淳、國府種武、宋登才、羅秋榮、廖宗龍。廣東當局策畫學生負笈東洋，目的在培育華南教育界、實業界青年才俊，一面學習高等專門學術，一面明瞭日本及信奉「東亞建設」要義，教化其成爲日軍侵略合理化的宣傳者。該會挑選的留學生共 22 名，男生 18 名以農業和商業爲主，女生僅 4 名，女子師範部的江容、黃賽婉；女子音樂體操學校的金孔嫻、崔麗。⁵³

綜上所述，華南文化協會是日方在廣東運作的教化組織，先從殖民地臺灣調派專員前往廣州，讓他們奉行各種日式教育事務，同時施展女子教化活動，旁及女子科的婦女工作、日式女教師培養、派遣教員赴臺女子教育的實地視察、指導留日學生。通過該會籌劃這些女子活動，以冀提昇廣東婦女對侵占者及維持會的向心力，一方面遏抑在地婦女群體的反抗力量；另一方面，將她們歸入「體制內」的控管範圍。

52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3（2000 年 6 月），頁 6。

53 〈官費留日學生訓練〉，《華南文化協會會報》（廣州），期 3（1940 年 2 月），頁 8。

三、博愛會醫院復辦與女看護

日軍攻克廣州市不久，為應付當地醫療防疫所需，隨即恢復博愛會醫院的業務。1938年12月，總督府由該院南支派遣衛生班，組成先遣班前往廣州設院，建立文德北路廣東公醫學會。直至1942年，隨日方接管市內的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後，博愛會醫院遷至該院址辦公，延續門診服務，⁵⁴看護婦及護理工作即為本節的論述重點。

(一) 防疫工作

日佔初期，院方為遏止霍亂擴散，率先組成防疫接種班的數支隊伍，派遣護士到各巷尾街頭，向當地居民施打疫苗，另於豐寧路的分院內關建隔離病舍，專門收容霍亂患病者。之後，該院護士更隨同日軍醫官，前往市面各熱點，執行強制注射任務，她們一邊注射疫苗，一邊盤查路人，須持有接種證明書，方可自由通過。⁵⁵

隨著日軍陸續攻佔廣東各縣，博愛會於各地設立分院，負起防疫事務。該院派遣女看護往赴「南支前線」，包括佛山、汕頭等戰地，輔助防疫注射工作。⁵⁶1941年，南海衛生

54 先遣班：院長山中覺、醫長井篋弘、醫員中島正、書記菊地七郎、藥局員廣瀨勘七、副醫員陳道瑞；汕頭博愛會醫院長河田幸一郎、書記長遠藤義雄。見臺灣總督府外事部，《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二伴フ對南方施策狀況》，頁182；〈博愛會廣東醫院新址 昨開始辦理醫務〉，《廣東迅報》（廣州），1942年12月15日，第3頁。

55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二伴フ對南方施策狀況》，頁184；〈防疫注射仍然舉辦 博愛分院設置病舍〉，《廣州民聲日報》（廣州），1939年5月26日，第2頁。

56 〈南支の惡疫を屠る博愛會醫員の活躍で〉，《臺灣日日新報》（臺

局為杜絕疫病發生，雷厲風行，派出防疫接種班 8 班，分駐於佛山市各要點，並由當地分院派遣衛生班，協同看護蒞場指導，宣稱每天注射人數高達 7000 多人。⁵⁷

博愛會醫院的防疫工作在 1939 年日本進犯海南島時到達高峰。⁵⁸ 由臺赴粵的護士尹喜妹為「一償戰地看護的宿願」及職場因素，遠赴海南島服務，⁵⁹ 並遇見戰前結識的廣東護士。⁶⁰ 臺灣帝國大學解剖學專家森於菟(1890-1967)率領的醫療班 20 多人。⁶¹ 從上可知，博愛會醫院的女看護多有戰時移動經驗，她們為日軍醫療的左膀右臂，展現不容忽視的女性力量。

(二) 娼妓的檢驗工作

戰火下的廣州城，許多熒熒無依的草根婦女，為求生存而被迫從娼。此時日本憲兵隊借公共衛生的幌子，嚴加監管娼妓業，一面劃定妓院營業區，一面大舉拘捕未領有從業執照的「私娼」。對佔領者及維持會當局而言，迅速恢復有牌妓館的營運，既可增加稅收，也向外展演市民「如常過活」

北)，1939 年 7 月 5 日，第 2 版。

57 〈佛山市開始防疫注射〉，《廣東迅報》（廣州），1941 年 4 月 13 日，第 6 頁。

58 鍾淑敏，〈殖民與再殖民——日治時期臺灣與海南島關係之研究〉，《臺大歷史學報》，期 31（2003 年 6 月），頁 169-221。

59 殖民政府在醫療人事制度上，出現日籍、臺籍護士的差別待遇。游鑑明，《日本殖民下的她們：展現能力，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頁 314-315。

60 游鑑明，《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頁 39-44。

61 小田俊郎著，洪有錫譯，《臺灣醫學五十年》（臺北：前衛，1995），頁 138。

的景象。透過報社記者的特寫，描摹廣州妓寨日趨暢旺，客似雲來，極盡聲色逸樂的盛景。⁶² 此輿論宣傳的表象，便需要有效的娼妓管理措施支持，看護婦在性病檢驗的實務便承擔了重要角色。

博愛會醫院為配合憲兵隊規定娼妓營業區，將「私娼」送至該會第一分院留院檢驗。依據井篋弘(1900-?)撰寫的娼妓調查報告，披露了該院專擅醫治娼妓業務，涵蓋預防性病、稽察、治療等，並曾以 228 位妓女為研調對象，仔細剖析各病徵的症狀。⁶³ 又，鑒於為數眾多的少女從娼，最年輕僅有 14 歲，須通知家屬具結認領，並須繳附醫藥費用。⁶⁴ 該醫院在處理娼妓問題上，由看護婦承擔照料者角色，使得染上性病的妓女，能獲治療，以保存性命。

1939 年 11 月，市內各大妓院正式開張迎客。日方為了有效操縱被捕的私娼，及博愛會醫院痊癒的妓女，成立長安花壇娛樂公司，專營公娼業務。此公司特別注重衛生問題，設檢驗處與醫務處，為全體妓女檢驗身體。報載該公司為市面繁榮的「一枝生力軍」，⁶⁵ 也報導該會護士援救娼妓的心得。護士李佩珍述說，基於「不良婦女」非法賣娼的行為，引致性病傳播擴散，故該院積極救治病患者，以改善公共衛

62 〈最近廣州妓院的巡禮〉，《廣東迅報》（廣州），1939 年 6 月 10 日，第 3 頁。

63 井篋弘，〈廣東人公、私娼ノ性病罹患狀態ニ就テ〉，《臺灣醫學會雜誌》（臺北），卷 40 號 1（1941 年 1 月），頁 185。

64 〈憲兵隊規定娼妓營業區經檢查無病者並准認領〉，《廣東迅報》（廣州），1939 年 10 月 19 日，第 3 頁。

65 〈全市妓館昨日開幕組織完備注意衛生〉，《廣東迅報》（廣州），1939 年 11 月 26 日，第 3 頁。

生，更歸功於日本長官的「功德」。⁶⁶ 由是以觀，侵略者或維持會當局的用心並非是娼妓個人健康，而是著眼於看護照顧，使娼女能及早痊癒從業，納入社會管控範圍的一環。

從維持會以迄廣州市公署建立間，以彭東原為首的傀儡政府，逐步將娼妓行業規範化，納入管轄，從中獲利。民政處轄下衛生科保健股負責娼妓檢驗及療治事宜，該科主任蘇儀貞(1898-1947)，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戰前曾在廣東博愛會醫院供職。迨至廣州市公署後，由公安處發營業照監管。當局先聘請博愛會醫院兼具臺灣經驗的下條久馬一(1891-?)，擔任公安處衛生顧問。⁶⁷ 各妓院須遵照妓館營業規則，凡當娼妓者，須具健康診斷書和申請書，並明定患有性病及未年滿 16 歲女子，則不得充當妓女。⁶⁸ 有鑑於此，維持會以公權力介入娼妓行業的監管手段，來解決滋生的社會衛生暨治安問題，但究其原因，此舉並非憐惜妓女，而是「恐防傳染病給他們的官兵（日軍），影響作戰」。⁶⁹ 當局對娼業的經管措施，絕非為妓女著想，而是站在「他者」利益衡量。

綜上所述，從看護婦輔助治療妓女的情狀，筆者可得出三個結論：一、揭示底層女性生活困苦。戰火蔽日下娼妓問題日益加劇，反映出平民百姓的生存危機，更糟的是，威迫

66 李佩珍，〈為妓女消毒克成後感想〉，《廣東迅報》（廣州），1939年11月28日，第4頁。

67 〈函聘下條博士為本署公安處衛生顧問〉，《廣州市公署公報》（廣州），期1（1939年12月），頁155。

68 〈廣州市妓館娼妓取締規則〉，《廣州市公署公報》（廣州），期1（1939年12月），頁6-11。

69 廣東省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卷5，頁433。

良家女子淪為慰安婦，也是日軍另一種「動員」廣東婦女的戰爭暴行。二、日方運作的維持會，動輒以社會衛生為名義，大肆整頓娼妓議題。此絕非從妓女權益考量，而是站在管理者的立場，將妓院納入「體制內」的管轄範圍，獲取營業稅收，既充實了通敵者的金錢利益，也充當為日方的中介協調者。三、看護婦做為救治患病娼妓的協助者。當妓女身患性病時，憑賴護士的悉心照料，同時貫注預防感染的常識，病者方可獲取痊癒的生機。

（三）看護養成訓練與宣傳

1939年11月，博愛會設看護養成所，建立日式看護專門課程。修業年限為2年，授課費用全免，但結業後須留院勤務1年。⁷⁰ 從報章所示，主要招攬17至20歲的年輕女子，受訓期間成績優異者，可獲聘該院正看護婦的薪酬。⁷¹

是時，私立葉醫院也設看護婦培訓課程，院長葉山松榮（1906-？，葉貓貓），臺北醫學專門畢業，長年於臺灣服務。1939年，他以博愛會派遣醫師身分前往廣東，曾任職該院外科專醫，後自辦葉醫院，⁷² 該院除救治貧病者外，也附設看護婦講習所，學員受專業培育後，至各公私營醫院服務。⁷³

在這期間，上述兩所醫院同時聘請廣東共榮會主事者并

70 〈廣東博愛會 設立看護養成所〉，《廣東迅報》（廣州），1939年11月1日，第3頁。

71 〈招考看護生佈告〉，《廣東迅報》（廣州），1941年3月8日，第3頁。

72 〈葉山松山博士 貢獻中日親善厥功甚偉〉，《廣東迅報》（廣州），1945年6月13日，第4頁。

73 〈廣東葉醫院 附設看護講習所 第三屆招考女護士〉，《廣東迅報》（廣州），1941年4月23日，第3頁。

上正男(1884-?)，負責醫院的日語教育及考核教務。1940年11月，他專為博愛會廣東醫院與私立葉醫院的護士，教授專門日語課程。⁷⁴ 單就博愛會醫院方面，他一邊向看護婦傳授日語，一邊擔任看護養成所入學考生的學科考核，⁷⁵ 此舉不單增進看護婦的日語水準，還有被派往臺北帝國大學附屬病院實習的機會。這些看護婦的實習點滴揭櫫於《廣東迅報》、《臺灣日日新報》、《婦女世界》，⁷⁶ 對內強化殖民地的醫學實力，對外利用媒體報導，營造教化與宣傳雙重的效果。

看護婦既可發展各界婦女支援醫療事務，也是報導「中日和睦」的媒體亮點。《廣東迅報》屢次刊載相關事蹟，勾勒中日友好的面貌。報載，廣州市某車夫妻子罹患霍亂病，有幸遇見正在執勤的博愛會醫院看護長三輪女士，才得以獲得治療，車夫以日後免收三輪車資，表達謝意及崇敬。⁷⁷ 省婦女會的貧婦留產院，訂定廉宜的住院費，並以「扶助殖民族復興中國」為名，增闢留產室，⁷⁸ 井篋弘等人擔任醫事

74 井上正男，〈對於教授日語之我的信念〉，《新亞》（廣州），卷4期1（1941年1月），頁77。

75 井上正男，〈我對教育上一點小貢獻〉，《新亞》（廣州），卷4期6（1941年6月），頁70。

76 井上正男，〈日本文的信與詩〉，《南星》（廣州），卷3期5（1941年5月），頁46-47；〈博愛醫院派遣女護士赴臺灣研究看護學〉，《廣東迅報》（廣州），1941年4月25日，第3頁。〈仕事のかたはら お花と書道を習ふ この頃の 廣東派遣看護婦講習生〉，《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1年11月11日，第3版。陳淑華，〈臺灣歸後的簡載〉，《婦女世界》（廣州），卷2期10（1941年10月），頁38-39。

77 〈中日親善之佳話 因看護救治妻室 車夫感恩圖報〉，《廣東迅報》（廣州），1939年11月1日，第3頁。

78 〈為扶助殖民族復興中國 博愛醫院增設留產室〉，《廣東迅報》（廣州），1939年11月23日，第3頁。

顧問，提供妊娠指導，確保產婦分娩安全。⁷⁹ 護士細心照顧新生兒的畫面載於《新中華畫報》，⁸⁰《新廣東畫報》則盛讚博愛會醫院慈祥的護士。⁸¹ 其中，汪政權於南京發行的《新中華畫報》，以中、英文描述護士日常工作，稱讚博愛會是華南唯一、中日合辦的醫療機構，體現中日友好事業。⁸²

《朝日新聞》刊載護士的第一人稱敘事，更強化了臨場及真實效果。俞慧美撰寫感謝文，敘說院內日常工作流程，如為病人量測體溫、檢驗尿液、輪流做飯。黃秀珍早上帶著病歷和溫度表，跟隨醫師巡診。午膳後，研習日語，主題之一為「弟橘媛」（日本武尊倭建命之妃）。⁸³ 日方媒體以看護婦賣力工作、虛心受教的感言，向社會大眾展示廣東佔領區的醫療事業發展，表彰護士的義舉、宣傳日方醫院的建樹。

綜上所述，日佔廣東下護士身負醫療救治重責，一方面執行防疫，為市內環境健康的地方守護者，有利日軍謀取當地的人力物力資源。一方面，是正面形象的宣傳大使。

79 〈貧婦留產院延聘 博愛院醫生為顧問〉，《廣東迅報》（廣州），1941年2月5日，第3頁。

80 〈插圖〉，《廣東迅報》（廣州），1939年11月23日，第3頁。

81 〈廣州的救濟事業〉，《新廣東畫報》（廣州），期2（1941年9月），頁29。

82 〈從白衣中透露出來的人類愛〉，《新中華畫報》（上海），卷3號9（1941年9月），頁6。

83 博愛會広東医院看護婦俞慧美さん，〈職場の親善 新支那女性の日記“日本史への感激”〉，《朝日新聞》（東京），1941年1月4日，第4頁；博愛會広東医院第2分院看護婦黃秀珍さん，〈職場の親善 新支那女性の日記“無事の1日”〉，《朝日新聞》（東京），1941年1月15日，第4頁。

四、廣東共榮會的女子教化活動

日本對中國頻頻的軍事侵略，文化宣傳戰場也應運而興。執行皇民化任務的共榮會發跡於廈門，隸屬臺灣殖民政府開辦的文化機構，⁸⁴ 廣東共榮會作為分支，仿照執行女性教化活動。

伴隨日軍侵占華南地區，該會將業務擴展至各地，邀集在地文化人士，合辦一系列撫慰活動。廣東共榮會成立，是由南支派遣軍報道部和臺灣總督府聯手張羅的宣傳機構。⁸⁵ 該會創始人佐藤敏行，時任總督官房臨時情報部部附，⁸⁶ 1939年10月中旬，由井上正男出任該會負責人。1927年井上任花蓮港高等女學校校長，1939至1942年間至廣東，擔任當地共榮會主事，籌辦文化事業的同時，透過婦人日語與戲劇教學，推廣廣東女子教化活動。⁸⁷

（一）井上正男的女子教化活動

井上正男憑著在臺的女子教育經驗，勉力推動廣東的女子教化活動。他先透過各種宣傳活動，灌輸日式教化的意涵，以教授女子日語為例，除編撰日語教科書之外，更前往各醫院、戲院場所，講授日語課程，以及在各大刊物中，分享他

84 〈昭和十三年廈門關係書類南支課（1937年1月1日）〉，《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檔號：002-00241。

85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編，《南支那綜覽》（臺北：南方資料館，1943），頁853-854。

86 〈南支文化政策の検討（本誌主催座談會）〉，《臺灣時報》（臺北），號256（1941年4月），頁29。

87 他在臺32年歷練，深受器重，曾獲昭和天皇頒授「正六位勳五等」。

對日語教育的想法與技巧。尤其在《婦女世界》專欄上，井上提出婦女應學習屬於女子日語，把婦德思想融入日語教材中，期能培育合乎日方要求的廣東女性。⁸⁸

井上正男的女子日語教育，聚焦在教化廣東女性，崇尚日式婦德的文化意識。首先，他把日語教學為教化工具，從中滲透「日本精神」。1941年，日本《朝日新聞》社特派記者專訪井上正男，盛讚他的日語教學，意在讓廣東人學習日本文化。井上著述的《日語寶典》，是廣東人學習日語的重要教科書。記者在隨同採訪新皇戲院時，細察井上教授一眾演員學習日語的過程，除活用粵語，還在黑板寫上50音，再使用日語說出「你好」，配合練習打招呼的手勢。⁸⁹他施展日語教育的理念，乃為「同化」當地人的一項文化策略。⁹⁰

其次，他向參訪者展示廣東女子教化的成果。1940年，長於臺灣的日本作家真杉靜枝(1900-1955)等人蒞臨廣東，井上正男隆重舉辦歡迎座談會。席間，井上邀請視察團員，觀看他所指導的話劇。後來，真杉靜枝在《臺灣時報》發文，分享遊歷廣州的所見所感，其中談到曾使用日語與廣東婦女談話間，言及自日本「恢復」市面社會秩序，讓孩童們抱以幸福和希望的心情，隨後，眾人更因汪政權的開場，而感到鼓舞人心。另又聞知，共榮會授予女性的日語課程，促使年

88 井上正男，〈婦人日語講座〉，《婦女世界》（廣州），卷1期3（1940年6月），頁43。

89 山田正男，〈大陸新文化の鼓動（上）〉，《朝日新聞（朝刊）》（東京），1941年7月26日，第5版。

90 對母語為廣州話的廣東人來說，難在短時期內改易慣常用語，此僅屬日人的期望而已。另在日占北平期間，也推出日語文化統合的構想。駒込武著，吳密察、許佩賢、林詩庭譯，《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頁328-335。

青婦女躋身復興事業陣線，這些都讓她深感廣東充滿「光明的未來」。⁹¹ 另一篇文中，真杉觀察共榮會的女職員學習日語的情景，其為投身復興前線，感到前程似錦。⁹² 可窺見井上正男透過教授女性日語，向日本文化界人士展現女子教化的碩果。

復次，他是《婦女世界》「日語講壇」的專欄作者，倡導女性應學習屬於婦人的日語。此專欄的首篇中，井上提點讀者學習語言，是「結合東亞民族與圓滿交際的基礎」。他演繹學習日語時，有成人、孩子、婦人、男子的語言區別，故「編成這專重於婦人方面所應學習的日語」，並附上日本婦人遵守的體法。⁹³ 在實際篇中，他還加入了涵養婦德的題材，如 11 講，解釋婦女遵守禮儀的重要性，應牢記在心。⁹⁴ 易言之，在他眼底裡，透過婦人日語專欄教學，開闢廣東女性學習日語的渠道，以增益她們的日語程度，同時在文本中倡導賢妻良母的觀念。

尤有進者，遍覽該欄的內容可知，他所編製的日語教材，多屬貼近廣州女性的平日瑣事。舉例來說，講授實際篇時，透過介紹在地家庭成員，學習慣常日語，介紹家庭地理位置、家族用膳時成員的座位等。⁹⁵ 另在談助詞時，採擷羊城民眾

91 真杉靜枝，〈廣東手記（隨筆）〉，《臺灣時報》（臺北），號 3（1941 年 3 月），頁 32-35。

92 真杉靜枝著，原ひろ子監修，《南方紀行》（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頁 51-94。

93 井上正男，〈婦人日語講座〉，《婦女世界》（廣州），卷 2 期 6（1941 年 6 月），頁 43-45。

94 井上正男，〈婦人日語講座〉，《婦女世界》（廣州），卷 2 期 6（1941 年 6 月），頁 47。

95 井上正男，〈婦人日語講座第 10 講〉，《婦女世界》（廣州），卷 2

生活作息為題材，譬如說「晨早7時收音機做體操；陳先生住在佛山。」⁹⁶ 井上正男運用切近常民生活百態的字句，藉以加快初學人士掌握日語竅門。

上文指涉的婦德觀念，是日本侵占者謀求操控廣東婦女的策略。由殖民經驗者現身幕前，表彰日式婦女文化，並以當事女性的第一人稱敘事強化真實的效果，但佔領地女性並非全然接受，特別是近代廣東婦女已有力爭女權的歷史，⁹⁷ 當局實難在短期內，改變在地人原有的地域性特質。

時人的追憶有別於官方宣傳的中日和睦。根據訓練所李玲所述，同行學員在臺考察時，其實思鄉家心切，無心參觀。廣東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長陳嘉謨則述日方「橫行霸道，酗酒強姦之風甚熾」。平民為躲避日軍，四處遷徙，導致許多小學收生不足，故當局將不少受訓教師，改派至官方單位任職。也有學生投身地下反日力量，如就讀廣東大學陳玲(陳新，1922-?)、省立第二中學莊碧君等。⁹⁸ 在亂離年代，林林總總的宣傳活動下，潛藏著許多官方未能抹滅的逆流。

期5(1941年5月)，頁51。

96 井上正男，〈婦人日語講座〉，《婦女世界》(廣州)，卷2期1(1941年1月)，頁46-48。

97 柯惠鈴，《她來了：後五四新文化女權觀，激越時代的婦女與革命，1920-193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

98 林沛端，〈抗戰時期廣州淪陷情狀〉，李齊念編，《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廣州：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輯4，頁206-207；李齊念編，《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輯7，頁317；陳嘉謨，〈廣州淪陷時期的教育概況〉，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廣州文史資料》(廣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63)，輯10，頁150；何君俠，〈敵後四年——在廣州淪陷區的鬥爭回顧〉，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廣州文史資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輯24，頁16。

(二) 領導廣東婦女的宣傳利器——《婦女世界》 (1940-1945)

《婦女世界》⁹⁹ 是由書館與婦女界共同研議而成的婦女刊物，與當時婦女組織有密切關聯。1940年2月，廣東共榮會旗下的協榮印書館主辦「第一次婦女座談會」，該館主編林欣欣與婦女界代表，連袂商討出版事宜。婦女會副理事長林國恩命刊名，劉玉函提議縫紉欄，為常識欄目，¹⁰⁰ 重要的類型還有婦女論壇、日語教育、醫學衛生、小說與文學、讀眾互動等。

婦女論壇類：宣傳婦女會的會務工作，推動婦運輿論，以該會成員為主的作者群。諸如林國恩撰文，力主中日婦女攜手合作，共創各項事業發展的新局。¹⁰¹ 日語教育類：井上正男的婦人日語專欄。醫學衛生類：引介日常婦女衛生知識、山安〈分娩時的安產法〉等。¹⁰² 這類文章都在強化婦女的日常生活新知。

小說與文學類：女性文學平台，如宋熹翻譯北川千代(1894-1965)的作品，¹⁰³ 以小說寫作方式，講解母教的責任及

99 詳參閱：盧梓滿，〈一本「附逆」女性刊物的萌生：《婦女世界》(1940-1945)〉，《陳百年先生學術論文獎論文集》，期14(2022年12月)，頁1-22。

100 〈第一次婦女座談會〉，《婦女世界》(廣州)，卷1期1(1940年4月)，頁4-6。

101 林國恩，〈我們對於日本婦女今後的希望〉，《婦女世界》(廣州)，卷1期1(1940年4月)，頁4-5。

102 中山安，〈分娩時的安產法〉，《婦女世界》(廣州)，卷1期1(1940年4月)，頁17。

103 宋熹譯，〈創作童話賣母店〉，《婦女世界》(廣州)，卷1期4(1940年7月)，頁8-10。

其方法。

讀者投稿類：編輯與讀者間互動，舉凡問答欄或讀者信箱；公開徵文，如「我的丈夫」。¹⁰⁴ 可窺見，此刊物採擷讀者徵稿的方式，建立編者與讀者雙向溝通的管道，增加內容的可讀性，藉以吸引更多新的受眾。

（三）東渡考察團

1941年3月至5月，井上正男率領員工，到臺灣和日本各地考察。隨行者有協榮印書館總編輯張雲史(1904-?)、副編輯林欣欣、職員羅慕熹，¹⁰⁵ 返抵省城後，各自在不同刊物發文，分享參觀經過和個人感受，以達親日宣傳效果。¹⁰⁶

張雲史以紀事詩稱頌日本女性體態以及賢妻良母教育。他參訪臺北州立基隆高等女學校，闡述日治女高教育的特色，傳授忠君愛國、相夫教子的倫理、家政的專業，此乃日本百業興旺的潛力，並摹寫女生勞作時展露的「健康美」。他提出廣東應學習日本的女子教育，以宣示殖民臺灣女子教育的優點。¹⁰⁷

104 〈婦女世界月刊徵文〉，《廣東迅報》（廣州），1943年6月19日，第3版。

105 〈協榮印書館組織日本文化考察團〉，《廣東迅報》（廣州），1941年3月27日，第3版。

106 林欣欣，〈訪問全程日記〉，《南星》（廣州），卷3期5（1941年5月），頁33-48；張雲史，〈東游記事詩四十首〉、〈東游四十節（一）〉，《新亞》（廣州），卷4期6（1941年6月），頁49-65；羅慕熹，〈寶塚一夜記（訪日見聞）〉，《婦女世界》（廣州），卷2期6（1941年6月），頁36-37；〈東川感想〉，《婦女世界》（廣州），卷2期7-8（1941年8月），頁1。

107 張雲史，〈東遊紀事詩四十首〉，《新亞》（廣州），卷4期6（1941年6月），頁52-64。

林欣欣以基隆高等女學校為良妻賢母典範，又稱讚臺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的女子體育鍛練，如男性般強壯。他們還轉往東京交流，並專訪井上正男家，表揚他是日本家庭楷模。林欣欣對井上正男的妻子特加著筆，讚佩她的賢明，也能獨力持家，好讓半生在外的丈夫無內顧之憂。¹⁰⁸

這些親日男性文人的遊記，一再頌讚日本的國力強大，既在展示日本殖民臺灣的優勢，同時也為廣東女子教化的借鏡，向廣東民眾宣傳臺灣的賢妻良母教育。他們塑造崇拜日本文化的優越感，一來緩和民間的反日情緒，二來使各界歸附日方統治。

綜上所述，廣東共榮會不僅作為日軍的文化宣傳機構，更充當著女子教化的要角。井上正男執掌期間四處奔走，講授女子日語、擔任《婦女世界》婦人日語專欄作者、帶領員工赴日臺視察，熱衷語言教學、婦女刊物、交流活動，以達致日軍總力戰下動員婦女的目標。

五、總力戰下「後方」的廣東女性教化與動員

太平洋戰爭開始後，臺、粵兩地俱為日本總體戰的「後方」，務求「大東亞戰爭」的民力動員。日軍在廣東運用臺灣的人力，配合各機構團體，掀起婦女界助戰的熱潮，一面展開戰爭宣傳行動，一面推動在地救濟措施。

（一）派出留臺女學生

108 林欣欣，〈訪問全程日記〉，《南星》（廣州），卷3期5（1941年5月），頁33-48。

日軍大舉進攻「東南亞」期間，汪政府仍安排廣東學生負笈臺灣，以加緊日式教化進程。這批留學生先經由中日文化協會廣東分會，興亞院及興亞獎學會等機關，按照各機關制定的招考選送章程，赴日留學。¹⁰⁹ 特別在1940年汪政權首創中日文化協會，1941年廣東分會開幕，由省教育廳長林汝珩(1907-1959)出任理事長，旨在弘揚中日文化交流的前程。在分會的業務中，包含辦理留日臺灣學生的公費，則由廣東特務機關長矢崎勘十(1893-1969)，向廣東連絡會議，撥出補助費軍票46萬餘元。¹¹⁰ 透過學生赴臺深造學問，不光是強化戰時臺、粵兩地互動關係，也顯露日治臺灣時期向外拓展的實力。

據日、臺留學生刊物《瀛友》，當局選派留臺學生有明顯性別差異，女生以教育、醫學為主；男生以農業為主。¹¹¹ 舒寶雲入讀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她最初暫居臺北郊外八光會館，期間學習日語。後來，考入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3年級，與日籍女學生共學，相處融洽。¹¹² 該文的在校經驗仍是重述賢妻良母的宗旨，提倡日本精神「要捨己為人」，蘊含女子為「國」奉獻的教化意識，這些一再提倡教育場域的用意，爭取認同。日方與汪政權精心安排廣東女學生赴臺「接受」的殖民教育，大倡女性應竭盡全力，並投入日軍後方動

109 廣東省教育廳編，《廣東省教育報告書》（廣州：廣東省教育廳，1943），頁21。

110 中日文化協會廣州分會，〈中日文化協會廣州分會工作狀況報告（1941）〉，收入龍向洋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民國文獻叢刊》（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冊56，頁142、155。

111 《瀛友》（廣州），期1（1944年12月），頁15-74。

112 〈臺北通訊（三則）〉，《瀛友》（廣州），頁37-43。

員的戰爭任務。然而，女子教育豐富意涵絕非僅此而已。¹¹³

（二）戰時廣東佔領地內看護婦的救援

1942年11月，臺灣殖民當局總務長齋藤樹(1888-1951)訪粵期間，特意訪察博愛會醫院，當時他對著70餘名中、日看護婦的致辭：期冀今後她們為「和平天使」，與日本攜手並肩，全力以赴為這份「神聖」的工作。¹¹⁴是時，博愛會醫院仍開設看護婦的培訓課程，充實醫務人手。1942年4月，該院登報聲稱，受海南島榆林市某公司所托，招募看護婦赴瓊供職。¹¹⁵此舉雖為廣東護士迎來工作機會，但戰時異地經驗也是苦痛。

1942年3月，葉醫院為日本京都府福知山市醫師會代募廣東女看護，赴日受訓。據報稱，應募者經該院嚴格挑選後，再於該醫師會附設看護婦學校受訓，到她們結業時授予「日本看護證」。¹¹⁶

城西方便醫院設高級護士班，曾受戰火波及一度停頓，後由臺灣人陳思齊(1906-?)大力贊助下，並擔任院方負責人，

113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8）；洪郁如著，吳佩珍、吳亦昕譯，《近代臺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頁150-155。

114 〈昨拜訪省市政府〉，《廣東迅報》（廣州），1942年11月11日，第3頁。

115 〈本市博愛會醫院代海南島榆林市某公司招募看護婦〉，《廣東迅報》（廣州），1942年4月29日，第3頁。

116 〈日本福知山醫師會在本市招募女看護〉，《廣東迅報》（廣州），1942年3月8日，第3頁；〈本市葉醫院代募看護婦〉，《廣東迅報》（廣州），1942年3月18日，第3頁。

才得以復辦。¹¹⁷ 時至 1942 年 7 月，方便醫院舉行首屆高級護士班畢業禮，蒞臨者有陳思齊、省衛生處長梁金齡(Leung Kam-leng)、主教巍暢茂(Antoine Fourquet, 1872-1952)等。巍主教先行致詞，稱揚陳思齊捐助該院賑濟窮民的經過，再由陳氏親自向學員頒發畢業證書。¹¹⁸

在戰況紛雜的情態下，日方除了博愛會醫院外，還有葉醫院、方便醫院，開辦訓練看護婦的場所，以增加醫療人手，甚至派護士往赴前方戰線服務。

另一方面，臺灣總督府因應日軍作戰步伐，便挑選臺灣的女看護助手，前往廣東佔領區內，奉行「後方」救援事宜。1942 年，殖民政府在臺徵募第一班看護助手接受短期訓練。之後，臺灣當局相續派遣臺灣特別志願看護助手，分赴港九、廣東的陸軍病院。廣東方面，日軍設立廣東第一陸軍病院，專責華南作戰的醫務與防疫工作。¹¹⁹

最足表徵臺灣看護的戰地境遇，應當是陳惠美（東惠美子，1927-?）記下的回憶錄。她先在臺接受短期的看護助手訓練班，即被派往廣東第一陸軍病院，肩擔救死扶傷的職責。她們在廣州期間，日方先安排教育訓練課程，待課程結束後，便立刻投入戰時應急救助行動，據陳氏追述，她為躲避空襲，

117 陳思齊經營福民堂的鴉片專賣事業，堪稱「鴉片大王」，陳璧君厲行嚴禁鴉片後，他將自家的鴉片業務，轉辦慈善事業。〈方便醫院當事〉，《廣東迅報》（廣州），1940 年 10 月 15 日，第 3 頁；許雪姬，〈1937-1947 年在上海的臺灣人〉，《臺灣學研究》，期 13（2012 年 6 月），頁 15。

118 〈方便醫院護士班昨舉行畢業典禮〉，《廣東迅報》（廣州），1942 年 7 月 7 日，第 3 頁。

119 吳欣樺，〈硝煙與白衣：日治末期的臺灣從軍看護婦〉，（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年 1 月），頁 34、52、54。

將身穿的白衣染成綠色，成了「綠色天使」。¹²⁰ 從中得見她們身處日軍總動員體制下，不論是殖民地臺灣，或是汪政權管轄下的女性，也必須移至前方戰地，救急扶危，切實改變了她們個人的生命經驗。

戰火硝煙期間，廣東護士身為支撐醫療事務的中流砥柱，維持戰時當地社會的衛生狀貌。其中經由博愛會醫院的女看護負責日常衛生工作；後因日方戰況趨緊，當局又派臺灣女看護助手赴粵，負起戰地救援急務。

（三）興亞劇團女藝員的戰時宣傳

1940年，共榮會籌組興亞劇團，藉助戲劇演出，宣揚日本發動戰爭的合理性。劇團先行延攬女演員，再利用她們的戲劇表演，歡娛市井黎民，為敵方作戰加持，以營造日軍侵略的正當性。

為迎合日軍宣傳戰起見，劇團廣攬大量藝員，並於報上刊登招聘公告。報名者一經錄取後，便成為劇團基本演員，除派往前線宣傳外，也在市內各大戲劇公演。緊接著，劇團又再招募女演員報名。¹²¹ 共榮會廣羅演藝界的翹楚，其中女演員不僅是戲劇藝人，並且做為戰爭宣傳上的得力助手。

另外，劇團響應日方的戰情，即開拓流動公演活動。1941年12月25日「黑色聖誕節」(Black Christmas)，日本率軍開進香港後，劇團以「為東亞民族解放之先聲百粵民眾」為名，

120 李展平等，《烽火歲月：臺灣人的戰時經驗》（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頁114。

121 〈興亞劇團 取錄男女演員〉，《廣東迅報》（廣州），1942年10月10日，第7版；〈共榮會興亞劇團刷新 繼續募集女演員〉，《粵江日報》（廣州），1942年10月10日，第3版。

加派演員前往增城公演，由日本藝術大師汪政文為領班人，偕同女藝員曼萍、冰兒等一行 10 餘人。她們獻演「烈士之魂」，大致描述烈士激烈抵抗白種人及清廷官兵等情節。¹²² 足見藉由公演戲劇，向普羅民眾散播列強壓迫中國的觀念，標榜著日軍作戰的正義感，以及其佔領的正當性。

救濟方面，陳璧君為救濟遺棄嬰孩，開辦難童收容所，卻又因收容難童人數多達 400 餘人，招致經費支絀。基於此，劇團在新星戲院盛大舉辦演劇募款，把收入所得，撥作救濟難童用途。與此同時，共榮會將入場券，分送各機關社團推銷，另派劇團團員組織勸募銷售隊伍，分赴各大商店、茶樓等勸捐。¹²³ 再加上，劇團為濟助戰火中的幼童，派出團員舉行公演，如「熱血貞魂」等古裝新派劇，內容以王妃召集英豪共赴國難，鼓勵從軍效忠。¹²⁴

興亞劇團成立 2 週年時，除增聘 500 多人，更在新星戲院公演，名為「風雨之夜」四幕劇。該劇是女史梁靜的得意傑作。¹²⁵ 隨後，報章上沸沸揚揚，讚賞演出者演技逼真，掌聲不絕於耳。¹²⁶ 女演員做為獻藝的當家台柱，不僅利用戲劇

122 〈興亞劇團前日 赴增城公演戲劇〉，《廣東迅報》（廣州），1941 年 12 月 31 日，第 4 版。

123 〈共榮會興亞劇團 演劇籌款救濟難童〉，《廣東迅報》（廣州），1942 年 7 月 15 日，第 3 版。

124 〈興亞男女劇團 籌款救濟難童 明日起公演名劇〉，《廣東迅報》（廣州），1942 年 7 月 24 日，第 3 版；〈興亞男女劇團 籌款救濟難童 開演第一日情形〉，《廣東迅報》（廣州），1942 年 7 月 26 日，第 3 版。

125 〈共榮會興亞劇團 成立二週年紀念〉，《廣東迅報》（廣州），1942 年 10 月 14 日，第 3 版。

126 〈興亞劇團演出 風雨之夜〉，《廣東迅報》（廣州），1942 年 10 月 21 日，第 3 版。

表演，達致聳動群聽的宣傳效果，且為救濟難童籌款，發揮了地方性的互助精神。

1943年汪政權宣告參戰，廣東方面即踴躍推動獻金運動，向廣大民眾勸募。這時興亞劇團也通力獻技，推展「解放東亞民族」的宣傳活動。劇團公演名劇「梨花吐艷」，把收入券款，撥充國防獻金。另為求各界熱情購券，特將入場券分送各機關暨團體代銷，再組織勸募隊，分途勸銷入座券。此名劇由余啓光、黎明二人編導，劇情為女伶奮力為戲界爭取光榮。¹²⁷ 如此一來，女藝人在劇中領銜主演，如飾演女伶，逞其賣勁演出，從中灌輸汪政權的政治意識，播揚其參戰的意義。

最為矚目的是，日據香港後，共榮會招納走紅粵劇壇的徐柳仙(1917-1985)，擔任特聘女藝人，並安排她前往省城獻唱。¹²⁸ 徐氏貴為粵曲平喉巨星，早已蜚聲海內外。

1942年4月，徐柳仙在金聲戲院演出，各報揚言這是事變以來，她首度登臺獻唱，引得眾多歌迷蜂擁而至。¹²⁹ 徐氏先唱出首本名曲「再折長亭柳」，盡顯歌喉；繼與徒弟徐碧霞合唱，全場鑼鼓喧天，台下聽眾掌聲雷動。¹³⁰ 在散場後，觀眾如響斯應，紛紛投書報端，誇讚徐氏歌聲悠揚悅耳，譽

127 〈興亞劇團演劇籌款 撥充國防費獻金〉，《廣東迅報》（廣州），1943年2月23日，第3版；〈慶祝國府對英美宣傳 共榮會興亞劇團 重演梨花吐艷〉，《廣東迅報》（廣州），1943年2月27日，第3版。

128 〈張月兒·徐柳仙 廣州州共榮會女囑託〉，《香港日報》（香港），1942年7月3日。

129 〈柳仙金聲初試啼聲〉，《廣州民聲日報》（廣州），1942年4月15日，第4版。

130 〈歌姬徐柳仙 昨夕登台歌唱情況〉，《廣東迅報》（廣州），1942年4月17日，第3頁。

稱「銷魂第一聲」，大負一時的盛名。¹³¹

而後不久，適巧方便醫院發起春季募捐，於是徐氏特地在省港船上義唱，迎來船員、搭客踴躍捐輸，並撥交該院，以充善舉。¹³²

廣東省政府為日軍出戰助威，便透過播音臺播放名曲，以供民眾收聽，即聘請徐氏向「全國」演唱新曲，並與樂家拍和合奏「南島春光」。¹³³

可見，當局藉助徐柳仙聲情並茂的歌聲，營構總動員的社會氛圍，遂而鼓動人心。這就是說，徐氏身為共榮會的女囑託，一方面，為救濟方便醫院而義唱；另一方面，擔任日軍的後方宣傳者，以助長其作戰的聲勢。

歸結來說，日軍進侵南洋後，被挾裹其中的廣東婦女，不僅是佔領者施以女子教化的對象，且奉行戰時女性動員的要務。在這淪陷時期，各界婦女屢受掣肘，相較於戰前廣東婦運的蓬勃發芽，她們失去了自主權，更遑論爭取婦女界的權益，儼然淪為戰火蹂躪下「加害者」中的受害者。

結 論

日軍佔領廣東各地後，賴以殖民地臺灣的一大助力，在總力戰思維下，策進各種女性活動，施以教化手段，開展婦

131 〈此是銷魂第一聲〉，《廣州民聲日報》（廣州），1942年4月17日，第4版。

132 〈徐柳仙 將義唱收入 送方便醫院〉，《廣州民聲日報》（廣州），1942年5月5日，第3版。

133 〈徐柳仙 今夕廣播名曲〉，《廣州民聲日報》（廣州），1942年8月12日，第3版。

女界輔助戰線，包括女教師的教育培訓、婦人的日語教育、女學生赴臺就學、發行《婦女世界》、看護婦醫療服務、女藝員招攬業務等諸多範疇。據此，身為侵略者的日本，藉助殖民地的人力，施展廣東的女子教化活動，形塑她們成為日軍作戰的「後方」支援要角。

大體來說，日方推行的女子活動，可分為教育、文化演藝、醫療三大界別。先說女子教育，當局由臺灣調派要員赴粵，先授予初等女教員的教育課程，使她們初步學習日式教育基礎，再安排赴臺考察活動，親身體會殖民教化的要點，讓她們奉行日式教育工作，教化莘莘學子，造就日軍的新生力；同時派出女生留臺深造，有意宣導殖民地女子教育的亮點，達成女子教化的效果。次看文化演藝，廣東共榮會舉辦各項文化事業，聘用女性文化從業員，來從事宣傳活動，推廣中日和諧文化，成為日軍文化宣傳戰的心膂股肱。再談醫療協助，藉著博愛會醫院、葉醫院、方便醫院等，培植日式看護婦，使她們一面負責診療服務，維持社會衛生狀況，一面派遣至前線，投入軍隊的救援工作。質言之，日軍精心製作廣東傀儡政權的背後，是仗恃殖民地臺灣的人力和物力，牽引著廣東各界的女性，誘使她們標舉「通力合作」大旗，為力挺日本作戰的愛戴者，抑或實是中國抗戰中的「加害者」角色。

綜觀本文論述中可知，殖民、佔領區、性別三者交織的過程。首當屬日本佔領者襲用殖民文化策略，統轄新佔領區內的婦女群體。在廣東遭烽煙洗劫後，日方指派具備殖民經驗人士赴粵，除在臺日本人外，還包含臺灣人在內，臺人本為被殖民者身分，伴隨日本全面侵華後，從被殖民者轉化成

輔助殖民者的角色，他們前往廣東各地，履行軍事增援要務，包羅教育、醫療、通譯等。與此同時，日軍在廣東佔領區內，廣東人做為新的被佔領者身分，當臺灣人在廣州遇見廣東人時，又或廣東人在臺灣，也助長雙方互動關係。換句話說，日本分別作為臺、粵兩地的殖民者及佔領者，刻意運用殖民地的臂力，指使各組織暨團體、兩地交流活動，強化兩地人士的聯繫，不單是支配在地婦女負擔後方勤務，甚且抬高日本女性觀念，一方面以統合各地女性力量，構成一個「共同體」，另一方面，對抗英美帝國主義在東亞的勢力擴張，銳意打造「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相反地，對廣東女性來說，她們為生存所迫，靦顏降敵，卻是遭受一場戰亂的生活鱗爪。從本文採用的報刊材料可見，日軍絕非從婦女權益出發，只從侵占利益考量，繼而利用她們充當戰爭的後援力量，加以合理化其種種的侵略行為。

至於殖民地臺灣婦女的反響？在日軍侵略熾盛的時代裡，當局徵召臺人為輔助作戰的支援者，同樣歷經沉痛的烽火鴻爪。游鑑明的研究點出，同一場戰爭，出現兩種際遇，也就是臺灣人本為被殖民者身分，更負擔日軍戰爭動員的要務。察看廣東佔領區內，可見這整場侵華戰爭下，徹底改變臺灣人固有的生活軌跡。最顯著的例證是——臺籍看護婦，誠如藍適齊分析葉秀香的生命軌跡，戰前身居廣東的臺灣女性，以醫療工作維生，擁有較高的個人自由度。中日交戰以後，情勢大不如戰前，在戰況激烈期間，日軍徵調大量的臺籍看護助手，迫使她們大多過著離鄉背井、戰火紛飛的苦日子。

其次，日方憑藉殖民地臺灣的人手，力助籌謀廣東各界

的女性活動，卻在迫使她們支援戰事。以花蓮女高退休校長井上正男舉隅，他擔任共榮會主事期間，致力於女子教化活動，不時到各大戲院、醫院等場所裡，傳授女性日語課程，並向她們推廣日式婦人形象，盛倡「日本精神」。他為婦人日語專欄作者，以日語教學管道，向女性讀者灌輸日式婦德教育的意涵，不外乎以男性角度的宣傳手法。在此期間，井上還策劃東渡考察團，帶領共榮會員工視察臺灣及日本各地，透過員工在各刊物中撰文，讚揚日人優渥的統治，尤其是臺灣的女子教育，以展現日本強盛的國力。必須注意的是，在戰火下，這些女子教化活動有別於傳統女性教育，反是利用響亮的宣傳名目，先使她們歸順於日軍佔領地的體系內，再讓她們從事各界工作，逐步滲透奉獻「大東亞主義」的價值，終而獻身入侵戰爭。

再引伸一步解釋，公領域中，井上正男被稱讚偉大的教育者，更獲昭和天皇授勳。然而，他傳授女子的婦德精神，僅從「國家」視角出發，要求她們負擔日軍作戰的要務，隱然成為「身體國家化」的一環。¹³⁴ 也就是說，對廣東女性而言，所謂的女子教化，是一種虛偽的支配權力，動輒以「大東亞」為名，鼓倡女性應守自身本分、責任，甚至動員婦女為敵國獻身。端看井上的家庭狀況觀來，私領域中，因他長期在外工作，妻子被迫獨自承擔家務與經濟，扛起教養子女、家中開支等，宛如日本在滿洲國的婦女動員辦法。參照滿洲境內婦女為例，統治者只強調婦女責任，而忽略女性的主體性，許多基層婦女處於饑餓不繼的苦境；此外，當局專以「聖

134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837)》（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頁281。

戰」之名，強迫婦女奉行後方動員勞務，導致她們陷入更困厄的燹劫。¹³⁵ 男性揭舉維護國家的旗號，聲張女性涉足作戰動員範疇內，從事繁重的後勤工作。復加上，各階層的婦女既承受家務、育兒等家庭勞動，也參與戰爭的動員活動，造成她們沉重的擔子。¹³⁶ 整體而言，日本的總動員體制下，廣東女性擔任「後方」的搖旗吶喊者，加重她們的負擔，獨自承受支撐家庭的壓力，更投身戰事動員行列，換來戰爭加害者的罪名。

日本投降，汪政權於一夜間傾滅，汪集團成員奔逃異鄉，這意味依附敵軍的廣東女性，陷入兩難的處境。戰後，重慶國民政府委派張發奎(1896-1980)負責廣東全省的接收事宜。際此張氏下命營建集中營，處置戰犯，由於日本護士擔負營內的衛生醫務，¹³⁷ 臺籍護士也牽連其中，須由陳儀公署優先返臺政策，卒能在1946年重回家園。¹³⁸ 次之，同年國府在接收產育院後，曾受井上正男日語教育、後赴臺學醫的黃秀珍，出任該院副院長，從事育嬰事務。此外，徐柳仙定居香港，幸而延續她的粵曲生涯。二戰後她們各自的遭遇，分別面臨「漢奸」審判、「遣返還籍」的窘境；或在原單位服務；

135 蔡雅祺，《製造戰爭陰影：論滿洲國的婦女動員(1932-1945)》(臺北：國史館，2010)，頁271。

136 倉沢愛子等編，《日常生活の中の総力戦》(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282。

137 廣東省黨部宣傳處編，《廣東省偽機關人員調查錄》(廣州：廣東省黨部宣傳處，1945)，頁101。

138 張建傑，〈田園將蕪胡不歸？戰後廣州地區臺胞處境及返籍問題之研究〉，《臺灣史研究》，卷6期1(2000年9月)，頁133-167；陳柏棕，〈戰地的白衣天使：臺灣人海外派遣從軍看護助手〉，《臺灣學通訊》，期100(2017年7月)，頁29。

遷往異地生活。不料爆發國共內戰，普羅女性又再陷於大裂變時刻的生命抉擇。

徵引書目

一、檔案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戰前期外務省記錄／H門 東方文化事業／7類 資料／2項 參考資料／O目 參考資料關係雜件／宗教、病院、図書館、博覧会、教会關係 第2卷》，檔號 B05016192400。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戰前期外務省記錄／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 1類／文化、文化施設 5項／学校 O目在外日本人学校教育關係雜件／国民学校教育費補助關係 第6卷》，檔號 B04011521200。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陸軍一般史料》，檔號 C11111586600。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號 002-00241。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號 00306520010007。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80200-00509-070。

二、史料

小田俊郎著，洪有錫譯，《臺灣醫學五十年》。臺北：前衛，1995。

中日文化協會廣州分會，〈中日文化協會廣州分會工作狀況報告（1941）〉，收入龍向洋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民國文獻叢刊》，冊 56。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頁 125-222。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輯 24。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輯 10，廣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63。
- 李展平等，《烽火歲月：臺灣人的戰時經驗》。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
- 李齊念編，《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輯 4。廣州：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 李齊念編，《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輯 7。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 東亞問題調查會編，《最新支那要人傳》。東京：朝日新聞社，1941。
- 宮本延人口述，宋文薰、連照美譯，《我的臺灣紀行》。臺北：南天書局，1998。
- 眞杉静枝著，原ひろ子監修，《南方紀行》。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
- 游鑑明，《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二件ノ對南方施策狀況》。臺北：臺灣總督府外事部，1943。
-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編，《南支那綜覽》。臺北：南方資料館，1943。
- 廣東治安維持委員會秘書處，《廣東治安維持委員會公報》。廣州：廣東治安維持委員會秘書處，1939。
- 廣東省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卷 5。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 廣東省教育廳編，《廣東省教育報告書》。廣州：廣東省教育廳，1943。
- 廣東省黨部宣傳處編，《廣東省偽機關人員調查錄》。廣州：廣東

省黨部宣傳處，1945。

三、報刊

- 《南星》（廣州），1941。
《南洋商報》（新加坡），1939。
《香港日報》（香港），1942。
《婦女世界》（廣州），1940-1941。
《朝日新聞》（東京），1941。
《華南公論》（廣州），1939。
《華南文化協會會報》（廣州），1939-1940。
《新中華畫報》（上海），1941。
《新亞》（廣州），1941。
《新廣東畫報》（廣州），1941。
《粵江日報》（廣州），1942。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9、1941。
《臺灣時報》（臺北），1941。
《臺灣醫學會雜誌》（臺北），1941。
《廣州市公署公報》（廣州），1939。
《廣州民聲日報》（廣州），1939、1942。
《廣東迅報》（廣州），1939-1943、1945。
《瀛友》（廣州），1944。

四、專書

-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柯惠鈴，《她來了：後五四新文化女權觀，激越時代的婦女與革命，

- 1920-193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
- 洪郁如著，吳佩珍、吳亦昕譯，《近代臺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 倉沢愛子等編，《日常生活の中の総力戦》。東京：岩波書店，2006。
- 陳麗華，《族群與國家：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1683-1973)》。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 游鑑明，《日本殖民下的她們：展現能力，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2。
-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8年。
-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
- 葉碧苓，《學術先鋒：臺北帝國大學與日本南進政策之研究》。新北：稻鄉出版社，2010。
- 蔡雅祺，《製造戰爭陰影：論滿洲國的婦女動員(1932-1945)》。臺北：國史館，2010。
- 駒込武著，吳密察、許佩賢、林詩庭譯，《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 Young, Louise.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五、論文

- 山本眞，〈戦時期の華南調査について—福建・広東を中心に〉，收入久保亨、瀧下彩子編，《戦前日本の華中・華南調査》。東京：東洋文庫，2021，頁 37-61。

- 中村孝志，〈廣東博愛會醫院をめぐる諸問題(2)—臺灣總督府の対華文化工作—〉，《天理大学学报》，號 166，1991 年 3 月，頁 1-24。
- 王學新，〈抗戰前博愛會醫院之運作與日本大陸政策之關係〉，《逢甲人文社會學報》，期 16，2008 年 6 月，頁 107-131。
- 王麒銘，〈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臺灣總督府の占領地協力について—広東を中心〉，《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論文集》，號 57，2017 年 6 月，頁 53-89。
- 朱德蘭，〈日汪合作與廣東省政府關係一個側面的考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卷 12 期 4，2000 年 12 月，頁 631-655。
- 吳欣樺，〈硝煙與白衣：日治末期的臺灣從軍看護婦〉。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年 1 月。
- 張建球，〈田園將蕪胡不歸？戰後廣州地區臺胞處境及返籍問題之研究〉，《臺灣史研究》，卷 6 期 1，2000 年 9 月，頁 133-167。
- 許雪姬，〈1937-1947 年在上海的臺灣人〉，《臺灣學研究》，期 13，2012 年 6 月，頁 1-31。
- 陳柏棕，〈戰地的白衣天使：臺灣人海外派遣從軍看護助手〉，《臺灣學通訊》，期 100，2017 年 7 月，頁 28-29。
-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3，2000 年 6 月，頁 1-75。
- 游鑑明，〈受益者抑受害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臺灣女性(1937-1945)〉，收入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202-219。
- 楊雅慧，〈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婦女(1937-1945)：日本殖民政府的教化與動員〉。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7

月。

盧梓滿，〈一本「附逆」女性刊物的萌生：《婦女世界》(1940-1945)〉，
《陳百年先生學術論文獎論文集》，期 14，2022 年 12 月，頁
1-22。

盧梓滿，〈汪政權成立前後廣東的婦女動員(1938-1945)〉，《政大
史粹》，期 35，2020 年 9 月，頁 113-149。

鍾淑敏，〈日治時期南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收入《中華民國史
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8，頁 2063-
2090。

鍾淑敏，〈殖民與再殖民—日治時期臺灣與海南島關係之研究〉，
《臺大歷史學報》，期 31，2003 年 6 月，頁 169-221。

藍適齊，〈「帝國」（未盡）的殖民／戰爭責任：二戰後在香港被
拘留遣返的臺灣平民〉，收入呂芳上主編，《戰後變局與戰爭
記憶》。臺北：國史館，2015，頁 187-222。

Women's Activities and the Role of Colonial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Guangdong

Loo, Tsz-Mun*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features of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ous women's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ed Forces and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namely as a facilitator by sending labor power,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Guangdong (1938-1945).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ied Guangzhou on October 21, 1938,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immediately appointed various commissioners to provide support and implement a series of social control measures. Masao Inoue 井上正男, retired principal of Hualien Port Girls' Middle School 花蓮港高等女學校, for example, moved from Taiwan to Guangzhou in 1939 to serve as the principal of the Guangdong Co-Prosperity Association 廣東共榮會. There he engaged in cultural propaganda and

**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rganized civilizing activities for women, evidenced by incorporating concepts of “female virtue,” namely supporting of the war effort under the guise of being “good wives and loving mothers,” when teaching local women Japanese. In other words, women’s civilizing processes in colonial Taiwan were not only the direct mobilization of Taiwanese women during the war, but also attempts by institutions stationed in Guangzhou to apply the experiences of Taiwan to likewise civilize and mobilize local women. This included women’s propaganda activities, female students going to Taiwan to study, on-site inspections of women’s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even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of Guangdong Hakuai Hospital 廣東博愛會醫院. Through the above, we can further explore how Japan reflected a “colonial experience” on the women of Guangzhou, compelling them to stand up as supporter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Keywords: Japanese occupation of Guangdong, Guangdong Co-Prosperty Association, Guangdong Hakuai Hospital, women of Guangdong, South China Cultural Association

